

# 论孟子的诚信思想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唐贤秋

(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 孟子关于诚信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四个方面:把“朋友有信”上升到“五伦”之一的高度;对“诚”作出道德意义上的规定,并提出了“思诚”的命题;认为讲诚信应是人的本性使然,即性善论的必然要求;系统阐述了如何取信于民的思想。孟子的诚信思想对后世直至当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孟子;诚信;影响

**[中图分类号]** B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51(2004)05-0069-(05)

## 一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自中国先秦社会以来,诚信就一直倍受人们的关注并为人们所大力提倡。孟子便是大力提倡诚信的一代思想家。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孟子,针对当时社会诚信缺失之状况,不仅大力呼吁人们讲诚信,而且对诚信思想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丰富了中国传统诚信道德的内容。孟子关于诚信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把“朋友有信”上升到“五伦”之一的高度;对“诚”作出本体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规定,并提出了“思诚”的命题;认为讲诚信是由人的本性使然,即性善论的必然要求;系统阐述了如何取信于民的思想。

第一,孟子提出了人际关系“五伦”说,并把“朋友有信”上升到“五伦”之一的高度。

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与他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孟子将这些关系称为人伦关系并提出了“人伦”的命题。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

司徒,教以人伦。”<sup>[1]</sup>这里的“伦”,就是一种伦常、伦理。“人伦”,就是指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或基本伦理。既然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与他人发生各种社会关系,那么,必须要有一种可供人们遵循的基本伦理规范,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规矩。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sup>[2]</sup>没有了规矩,社会也就没有了秩序,这正是“圣人有忧之”的原因。那么这种秩序又是什么呢?孟子提出了“五伦”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sup>[3]</sup>在孟子看来,人伦有五: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社会关系。孟子的“五伦”说,基本上概括出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孟子把“朋友有信”纳入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当中,认为“信”是朋友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体现了孟子对诚信之德的高度重视。

第二,孟子对“诚”作出道德意义上的规定,并提出了“思诚”的命题。

“诚”、“信”二字在战国中期以前是没有连在一起使用的。“诚”在战国中期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但出现的频率远没有“信”出现的频率高。《今文尚书》中出现“信”字有7处,而“诚”才出现1次。《论语》中出现的“信”字达38处之多,却才出现2处“诚”

**[收稿日期]** 2004-04-23

**[作者简介]** 唐贤秋(1965-),男,湖南东安人,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主要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化研究。

字,而且只作形容词理解,并没有其道德意义。《左传》出现的“信”字达 217 处之多,而出现的“诚”字,才仅仅 1 处。可见,战国中期以前,虽然出现了“诚”字,但人们又很少谈“诚”。而到了战国中期以后,“诚”的出现频率便大大提高了。在子思所作的《中庸》里,“诚”字出现了 26 次,《孟子》一书中出现“诚”字 22 次。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春秋以后至战国中期以前,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诚信缺失状况相当严重。因此,人们对“信”德强调的自然要多了。先秦儒家在对现实的反省过程中,最先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在的“信”字方面,而没有更多地从内心之“诚”方面进行反思。随着先秦儒家对现实反思的深入,他们将视线从“信”移向“诚”,较多地从内心之“诚”方面来探讨外在的“信”德缺失之因。这正是战国中期以后“诚”的出现频率提高的重要根据。对此,杨向奎指出:“‘诚’是思孟学派继周公、孔子提出‘德’、‘仁’之后的第三课题”。<sup>[3](P286)</sup>

孟子对“诚”的认识是建立在子思的“诚”学基础上的。子思在《中庸》一文中认为:中庸之道的主要内容是“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其实,“五达道”就是孟子后来解释的“五伦”。为了实现“五达道”,《中庸》提出了“诚”的学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即天道本身是讲诚信的,而人通过努力去做到讲诚信,这是人道的必然要求。孟子继承了子思的“诚”的学说,并对“诚”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動,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sup>[2]</sup>即认为“诚”是天道的体现,“思诚”是人道的要求。这种要求的目的在于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这种要求的表现于获“信”于他人。所以,孟子说:“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sup>[4]</sup>在这里,“思诚”与“诚身”是一个意思,就是使自己达到“至诚”的境界。而这种“至诚”境界的外在表现,就是取信于人。这样,孟子将“诚”与“信”有机地统一到了一起。“信”在孟子那里成为沟通天道“诚”和人道“思诚”的桥梁。然而,人怎样才能做到“诚”呢?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sup>[2]</sup>指出诚身的方法,就是要明确认识天赋的善性,使本身具有的善性同天道实有的善德相一致。王夫之在解释孟子的“诚”字说:孟子之“诚”,“尽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谓也。”以“诚”作为天道,以“思诚”(即体现“诚”)

作为人道,这是孟子与子思的思想共同点,但二者所指的含义则是不同的,子思之“诚”,乃“真实无妄之谓”。<sup>[5]</sup>而孟子之“诚”,除了上述含义外,又充实以善德,即把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概括为宇宙的本体,从而突出了诚信之德的天人合一性。

第三,孟子认为,讲诚信是由人的本性使然,即性善论的必然要求。

人性问题,是先秦思想家热烈探讨的重要话题。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sup>[6]</sup>但人性到底如何?孔子没有更多的阐述。孟子第一次明确赋予人性以善的规定。他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四种善的萌芽,他称之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sup>[4]</sup>在孟子看来,“四端”扩而充之,便是仁、义、礼、智“四德”。因此,仁、义、礼、智是人性所固有的善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sup>[4]</sup>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这是孟子性善论的主要内容,孟子的伦理道德基础正是基于此。

孟子的人性“四端”说,虽然没有提出“信”,但决不可说孟子在人性论中不重视“信”。郭沫若认为,“信”德,“在孟子的学说系统上并没有缺少,‘信’就是‘诚’了。”在郭沫若看来,子思、孟子都强调“中道”,事实上则是把“诚”当成了万物的本体,其所以然的原故正是因为诚信是位于五行之中极的。<sup>[7](P137)</sup>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作为道德范畴的“信”具有善的属性。那么,讲诚信自然是人的本性的必然要求了。而那些不讲诚信者,并不是人的本性使然,而恰恰是对人的本性的违背。所以,违背人的本性,正是人们出现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

第四,孟子系统阐述了如何取信于民的思想。

“民无信不立”,这是孔子强调的重要思想。孟子继承了这一点并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以致取信于民。孟子把“仁”与“人心”联系在一起,强调“仁也者,人也”。<sup>[8]</sup>“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sup>[8]</sup>这样,孟子把“仁心”当作了“仁政”的来源,说先王“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sup>[9]</sup>可见,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性善论。

以实现“仁政”为目的,孟子提出了保民、爱民与富民的主张。孟子认为,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所以,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sup>[8]</sup>既然民众的力量巨大,那么得到民众的

拥护就是得“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sup>[10]</sup>所以，孟子主张“保民而王”。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sup>[11]</sup>然而，又如何才能保民呢？孟子接着提出了“制民之产”，即富民的主张。为此，孟子勾勒了一幅保民富民的美丽图画：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sup>[11]</sup>

在孟子看来，只有老百姓富裕了，并教给他们孝悌忠信之义，那么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讲究仁义忠信。这样，政治就可以取信于民，君主也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

## 二

孟子的诚信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赋予诚信之德以重要地位。把“朋友有信”提升到“五伦”之一的高度，实质上是突出了“信”在处理朋友之间关系中的重要性；对“诚”的系统阐述，并规定诚信之德的天人合一性，这是从尊重天道的角度来强调对人道的遵守，实质上这仍然是强调诚信之德的不可违背，否则便是违背天人之道；认为讲诚信是人的本性使然，实质上是强调对诚信道德的遵守便是对人之本性的尊重；不遗余力地阐述以“保民”、“富民”为主要内容的“仁政”思想，实质上是强调了统治者取信于民的重要性。孟子的诚信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诚信道德的内容，它对后世直至当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孟子将“朋友有信”提升至“五伦”之一的高度，实质上确立了“信”在调节人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信”也因此成为调节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重要伦理规范。当然，孟子的“朋友有信”思想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社会的熟人交往之基础上的，这一思想特点对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封建统治者继承了孟子的人际关系“五伦”说，并经过加工改造成为处理人际关系道德准则的“五常”。“常”，即恒常、永恒的意思，就是说，“信”与“仁、义、礼、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调节人际关系永恒的道德规范，即“五常”。在封建社会，“信”不仅成为封建社会下国民心理所普遍产生的文化认同，而且在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纷繁复杂，随着经济交往的愈加频繁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早已突破传统的熟人交往的圈子，因而孟子的人际关系“五伦”说，已远远不能涵盖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全部内容。然而，“信”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信”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规范，已不再局限于调整朋友、熟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它还调整着大量的非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表现在经济领域则是一种经济关系，表现在政治领域则是一种政治关系，表现在社会生活等领域则是各种社会生活关系。无论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还是社会生活等关系都离不开诚信这一基本的道德准则。打一个比方，如果将社会的各种关系比作一架正在运转的大机器，那么，“信”则成为维系社会这架机器正常运转的一个基本链条。也就是说，“信”不仅成为熟人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而且也成为非熟人之间交往的伦理准则。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丧失诚信这一基本的道德准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便不能维系下去，整个社会这架机器便无法运转。因此，孟子将“信”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凸显出其强烈的时代意义。

其次，孟子从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角度论述“诚”之必需，以及从人性本善的角度论述讲诚信之必要，实质上是从人学的角度突出了诚信之道的人文意义。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禽兽，在于人能讲礼义、讲诚信，人具有“人伦”规范而其他动物不具有。所以，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sup>[1]</sup>在孟子看来，人“有道”、“有教”，正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根据。何谓“有道”？《易传·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且义”。《春秋穀梁传》言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sup>[12]</sup>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而不为禽兽，就在于人有人伦之道，人有道德，讲仁义，讲诚信。这种思想对抑制当代社会出现的诚信缺失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市场经济的求利原则大大激发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本来无可厚非，因为求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人们求得生存的一个基本物质条件。但是，人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如果把求利欲望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的话，那么孟子所说的“人之有道也”便是人的社会属性。荀子也

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sup>[13]</sup>荀子在这里将人“有义”归结为“最为天下贵”的重要原因,与孟子的“人之有道也”是一致的,仍然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因此,人的社会属性要求其在获取利益时,必须遵循手段的正当性。而不是相互欺骗、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更不是你抢我夺、弱肉强食,否则必将导致物欲横流、兽性回潮,因而也就与禽兽无所差别了。因此,孟子的诚信思想所凸现的人文关怀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最后,孟子系统阐述其“仁政”主张,实质上是突出了政治统治取信于民的重要性。孟子之所以主张统治者实行“仁政”,是因为他认识到民众对统治者当局的信任与否是决定统治者政权是否巩固的关键因素,而统治者实行“仁政”,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正是统治者得民心之举。孟子的“仁政”思想当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但他的“仁政”以得民的思想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正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建立政府诚信的问题。因为,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政府失信现象。政府失信,其实质是对人民的失信。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无所谓有政治文明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sup>[8]</sup>孟子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天下矣。”<sup>[2]</sup>孟子在这里指出了民众的重要地位和得民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该摆正人民群众的位置,理顺政府和人民、干部和人民的关系,正如胡锦涛所强调的,党和政府的干部要时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句话,以民为本、取信于民,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孟子关于民本思想的时代意义。

### 三

孟子的诚信思想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信”在孟子的人际关系“五伦”说当中并不是居于首位的道德义务。“五伦”是孟子对人际关系基本道德规范的主要总结。其中以“亲”、“义”、“序”、“别”、“信”五种伦理道德规定着父子、君臣、长幼、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就是说,处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此四者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分别是“亲、义、别、序”而不是“信”,而只有“朋友”一伦才突出“信”。其实,除了

“朋友有信”之外,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间也必须是讲信的,但孟子却并没有这样规定。在孟子看来,在处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等关系时,相对应的“亲”、“义”、“序”、“别”等规范是超越于“信”之规范的。尽管“信”与这些道德规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是“信”终究不等于这些道德规范,如果“信”与这些规范发生某种冲突,“信”却是让道于这些规范的。这说明,孟子心目中的“信”在处理父子、君臣、长幼、夫妇之间的基本关系方面并不是最基本的道德义务,即没有体现出“信”的优先原则。孟子甚至明确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sup>[14]</sup>从而公然地为一些“大人们”不讲诚信开绿灯。

另一方面,孟子的“信”具有适用范围中的不平等性。从表面上来看,孟子的“朋友有信”思想体现了朋友交往的平等性,孟子也专门论述了交友之道:“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sup>[15]</sup>即交友不能依仗年长,不能依仗显贵,不能依仗兄弟的富贵。就是说,交友主要是结交其道德,而不应有所贫富长幼的区分。所以,人们一般看来,孟子的“朋友有信”思想,体现了信在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谭嗣同就认为,“五伦”中惟朋友一伦体现了一种平等。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sup>[16]</sup>其实,谭嗣同只是说对了一半,他只是在将“朋友”一伦与“五伦”中其他种类的人际关系相比较时,才相对地具有了平等性。但他却忽视了“朋友”产生于其中的社会大环境。那就是,先秦社会是一个等级鲜明的宗法血缘性社会,这种等级差别性必将会对各种社会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孟子为什么分别用“亲、义、别、序、信”来规定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的伦理规范之真正原因。孟子之所以这样提出“五伦”人际关系之伦理规范,其目的在于从道德上为人与人之间划分出等级差别,从而为维护君臣、上下之间的等级制度提供理论根据。这样,产生于其中的朋友关系同样不能例外,尽管朋友关系的宗法血缘性比较淡薄,但不平等性是存在于朋友关系之中的。因为,不平等是宗法血缘关系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产生于这种社会结构上的各种道德规范在调节人际关系时必定会体现出不平等性,即使是“信”也是如此。反过来,先秦宗法社会中所产生的包括“信”在内的种种道德规范又对宗法社会的不平等性起到了巩固的作用。

孟子诚信思想的这种局限性,对当今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首先,诚信在孟子那里并非体现出优先原则,这就很容易使得人们产生歧义,从而不将诚信视为居于第一位的道德义务。也就是说,当诚信与其他原则发生冲突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他原则,而非诚信原则。这就不难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诚信缺失现象的深层文化原因了。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人们往往优先考虑的是求利原则而并非是诚信原则。而当求利原则与诚信原则发生冲突时,人们也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求利原则而放弃了诚信原则。其次,孟子的“朋友有信”,仅仅局限在熟人关系当中。也就是说,诚信原则也仅仅体现在熟人之间的交往上面,那么非熟人之间的交往是否应该遵循诚信准则呢?孟子没有说。鉴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孟子也不可能提出非熟人之间的交往应该遵守的规则。由于孟子诚信思想的这种局限性,使得它无法解决当代社会条件下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种种矛盾。用孟子所生活的特定时代而产生的“朋友有信”,来简单地套用到当今社会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必定会显现出它的无能为力的一面。这使得孟子的诚信思想在当代社会面临着实践过程中的尴尬局面。其三,孟子的“朋友有信”所折射出的另一面,“信”,并不是对父子、君臣、夫妇和长幼之间的关系提出的基本要求,因为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社会里,父子就是父子,君臣就是君臣,夫妇就是夫妇,长幼就是长幼,如果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当作朋友来对待,那必定是大逆不道。这样,“朋友有信”,也只能体现出是对一般的普通百姓提出的当然要求了。既然“信”对君臣之间没有约束力,那么君臣之间可以带头不讲诚信了,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真正原因。而能称为“大人者”,当然是指那些统治者了,统治者不讲诚信而“惟义所在”,那也必定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统治者不去讲诚信,要想在社会造成讲诚信的风气自然也不可能。但是,孟子诚信思想对“大人”们所开设的这种“绿色通道”,必定会造成那些“大人”们的许多优越感。这对当代社会的消极影响仍然是存在着的。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当代社会中,拥有某些实权的一些政府官员,口头上喊讲诚信,而行为上却始终没有以诚信来约束自己。这应该说与孟子诚信思想所体现出的局限性是有着一定文化联系的。

#### [参考文献]

- [1] 孟子·滕文公上[M].
- [2] 孟子·离娄上[M].
- [3]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4] 孟子·告子上[M].
- [5] 朱熹.中庸集注,四书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6.
- [6] 论语·阳货[M].
- [7]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8] 孟子·尽心下[M].
- [9] 孟子·公孙丑上[M].
- [10] 孟子·公孙丑下[M].
- [11] 孟子·梁惠王上[M].
- [12] 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M].
- [13] 荀子·王制[M].
- [14] 孟子·离娄下[M].
- [15] 孟子·万章下[M].
- [16] 谭嗣同著(吴海兰评注).仁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庄道树]